

北京十年

罗孚
罗孚



罗孚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十年

罗孚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十年/罗孚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罗孚文集)

ISBN 978-7-5117-0834-2

I. ①北…

II. ①罗…

III. ①北京市-野史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017号

北京十年

出版人 和 龔

策 划 高 林

责任编辑 叶 芳

编辑信箱 yefang58@gmail.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3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1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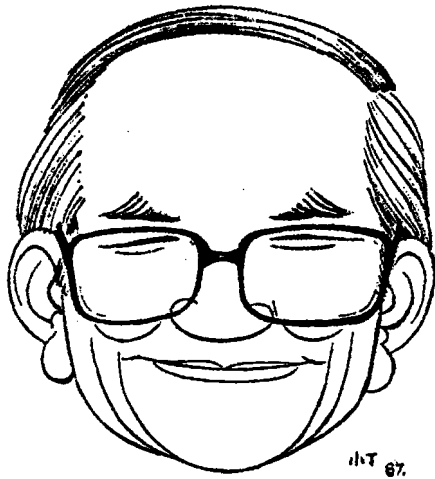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作者自序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我把它命名为《北京十年》，其实是我的见闻和回忆杂记。

这本东西写出来，快二十年了。有些事情是根据当时的时日为准记下的，如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多少年前，那是指相距写作的年代而言，现在也没有去改为今天准确的说法了。

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

罗 孚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陈子善

罗孚先生是香港报人、作家，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北京，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间，也即他蛰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应邀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录〉》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散会时我冒昧地提出能否会后拜访他，能否与他通信，因为我有许多关于周作人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一口答允，并当场写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诉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须写“史林安”而不是“罗孚”。

其实，罗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我对他的辉煌过去只略知一丁点儿，或者说一丁点儿也没有，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我深知，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老人家已答应我可以写信也可以拜访请益，

夫复何求？

于是，我第二天就出现在他寓所的客厅里，也即他在《北京十年》开头几章中详细描写过的双榆树南里寓所。如果不是这次重读《北京十年》，当时室内的情景真的已不复记忆了，只记得我们一老一少，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谈周作人谈曹聚仁谈叶灵凤谈香港文坛的人和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如沐春风，受益真的是匪浅。记得在离京返沪前，我还拜访过他一次，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还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〇年代的手稿，这对我编选《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不啻是个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却在北京，不知何时可南返，我想看到这些珍贵手稿的话，只能耐心等待。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罗先生知道我爱书如命，不断赠我他在北京三联以“柳苏”笔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书，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毛边本，在第一集扉页上题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 罗孚 一九八八、四”，令我如获至宝。罗先生离京前一个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刚走进他家门，他就埋怨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书已有不少被别人捷足先取了，你赶快挑选需要的，再不拿就来不及了。记得我当时捧走了几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书刊，那晚罗先生特地在他住

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颇有“来头”的饭店里请我吃饭，罗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虽然后来在香港我还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这顿饭至今还仿佛齿颊留香。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那时罗先生已经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译作），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四月十七日晚鲍耀明兄妹宴请，罗孚、罗海星夫妇、陈胜长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访罗孚，欣赏罗孚藏画（张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请，同席柯灵夫妇、罗孚等。

日记中提到的吴其敏先生、罗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灵先生夫妇都已经不在了。吴先生也是香港前辈作家，正是罗先生的引见，我与他有此一面之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一诺千金，我终于见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即《药堂谈往》）手稿和一九六〇年代的著译手稿多份。《知堂回想录》手稿厚达一尺余，他沉甸甸地亲自拎到茶楼，让我仔细翻阅。后来他把这部珍贵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周

作人六〇年代的其他著译手稿则全部复印赠我。其时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早已问世，我就把手稿中还没有发表过的十余篇提供给钟叔河先生编入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了。当时我写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记其事，我认为罗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〇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用罗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忆文集，《北京十年》也是一部散文集，就像罗先生自己所说，文章虽然告一段落，但回忆永远不会结束。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

《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罗先生交游广阔，《北京十年》中记录最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包括访谈、聚会、酬酢和唱和等等。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风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哪怕只有聊聊数笔，都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呼之欲出。这些文坛前辈八十年代的思想、情感、个性、言谈，乃至种种有趣的细节，通过他的妙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存，很有研究价值。至于他以较多篇幅叙写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的其人其事，在我看来，也是大有深意在矣。

罗先生的散文是别具一格的，他是香港众多散文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论者指出：罗先生散文“以史料的丰富和准确，见识的精当和新颖，叙述的晓畅和有趣为特点，在可读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路数上进行了尝试”（引自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九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对《北京十年》，我以为也应作如是观，而且锋芒更为犀利，文笔更为老到了。纯净如行云流水，平实中见机智幽默，本是罗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十年》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我一个晚上就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书、事一一生动地浮现眼前，真有爱不释手之感。

值此罗孚先生九十大寿之际，随着《北京十年》的问世，《罗孚文集》出齐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罗先生在文学长

途上努力精进，不断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仅为研究香港文学史，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以上这些“北京十年”期间与他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往事以为贺，并祝罗先生长寿颐年，身笔双健！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话说罗孚

高 林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一九二一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一九四一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四十一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一九四七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一九四八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风兮归来，霜红正晚。七十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一九五七年）、《西窗小品》（一九六五年）、《繁花集》（一九七二年）和《香港文丛·丝韦卷》（一九九三年）。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一九八二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

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一九八六年）、《香港文化漫游》（一九八七年）、《香港作家剪影》（一九九二年），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一九九七年）。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諲，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一九九七年）、《丝韦随笔》（二〇〇七年）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一九九八年）。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

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涓（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I / 作者自序	罗 孚
II /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陈子善
VIII / 话说罗孚	高 林

辑一 我和我的朋友们

003 / 十年不寻常
005 / 与齐白石为邻
007 / 大钟接蓟门
009 / 电子一条街
011 / 我的邻居们
014 / 小报与大报
018 / 小朋友、女朋友
020 / “没关系”小姑娘
025 / 无为的姑娘们
043 / 从寻找聂绀弩开始
049 / “文史馆”喷饭
052 / 两位老前辈

- 056 / 三个朋友
059 / 王、吴的官司
064 / 小丁和老杨
069 / 话说圆蹄
075 / 杨家的欢聚
080 / 朋友的圈子
086 / 冯友兰和四皓
088 / 舒芜的诗
095 / 向钱看而向“钱”看
099 / “小饼干”萧乾
104 / 夏衍和旧梦
113 / 钟敬文和启功
124 / 话说周而复
128 / 陈迺冬和窦尔墩
132 / 王益知和田象奎
136 / 章士钊的文和诗
149 / 萧红的头发和骨灰
152 / 宜兴马和仰雪馆
154 / 苗老汉和牛油诗
168 / 他一身都是专家
172 / 常任侠的诗和情
176 / 卞之琳和臧克家
180 / 李锐·庐山·三峡
185 / 三松堂上一老人
193 / 笑煞邕漓父子王
201 / 文学大师的惊叹